

主编 孙晓雷

赤峰八十年大事记

方志出版社

新石器时期

距今约一万年前

赤峰地区人类最早的活动遗迹在翁牛特旗山咀子乡上窑村一洞穴中发现。洞穴地处距地面高 100 余米的老虎洞山顶，洞穴附近发现了人类使用过的原始打制石器，以及经过烧烤、食用过的肿骨鹿骨骸。经考古学界鉴定，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距今约一万年至八千年。这一发现揭开了赤峰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

距今约八千年前

兴隆洼文化先民生息、繁衍在今赤峰大地，这是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时代最早、保存完整、内涵深邃的新石器时代远古文化，考古界和史学界定名为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

首次（公元 1982 年）发掘地点，位于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聚落遗址筑于村东南低缓的丘陵地上，西南山间泉水细流，终年不枯，东面为牤牛河支流，地理环境优越。据地下发掘的花粉孢子分析，当时的植被覆盖率高达 97%，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 2℃，胡桃楸等史前人类的食物遍地生长，喜土质肥沃、气候湿润的落叶、阔叶乔木随处可见，组成温带落叶阔叶和针叶混交林，极宜于人类居住、生息。

兴隆洼聚落是一处规模壮观、构筑严密的原始建筑，在 180 余米的椭圆形围壕内，整齐地排列着十余排 100 余座房屋，座落在聚落中心位置的大房子，面积达 140 平方米。所有的房屋均为方形圆角，整齐划一，

房屋中间为灶址,四角或两侧立房柱,屋内挖有储藏坑,不设门道,系我国北方原始的“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氏族成员“以梯出入”的建筑格局。每一座房子即是一个小单位,一排房子便是一级社会组织,围壕之内所有的成员便是大的氏族群体,即以亲族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大房子”即是氏族公社议事或宗教仪式的中心,是氏族成员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象征。聚落西北最高处辟有“寨门”,两侧各筑一小房以为“门卫”所居,护卫着氏族成员的生产、生活与安全。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出土遗物极其丰富,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独具特色,其中陶器器表,大多压印、刻划3—5种不同纹饰,从口、肩、腹三个部位分列,极为雅致大方。渔猎所用的鱼镖,多带“倒刺”,刃部镶有细石器,坚实锋利。

兴隆洼氏族成员的“居室墓”,生者与死者“同居”一室,人与猪合葬,中国最早的服饰——以蚌壳制成精致的“蚌裙”作为美的装饰,中国最早的软玉(真玉)——玉玦首次出土,孕育着中国“尚玉”传统。

兴隆洼文化遗址除敖汉境内发现外,考古人员还在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等地发掘了相应的遗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积石冢”(即氏族公社共同祭祀的场所),屋内供有“灶神”或其他石雕神像,已脱离了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进入到神像崇拜。所有这些,表明八千年前西辽河上游今赤峰地区,正处在中国远古社会由氏族阶段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社会组织、防卫设施、意识形态、宗教礼仪也正在按着国家的要求孕育、发生。这是赤峰先民对中国八千年文明史的卓越贡献。1983年秋至1984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兴隆洼文化遗址进行7次大规模发掘,1992年和“八·五”期间被列入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载入史册。

距今约七千年前

赵宝沟文化先民生息、定居于今赤峰市敖汉旗境内。赵宝沟聚落

址,位于今敖汉旗赵宝沟村西北约1公里的漫岗上,占地9万平方米,地势缓坡向阳,四周低丘环绕。村前有一道季节河向东注入教来河,泉水细流终年不断。地表可见房址约140余座,东西向整齐排列,其中西北片尤为密集,规模较大,数量较多,遗址东南向小山岗上有一处用自然石砌筑的长方形祭坛。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正式进行发掘,清理房址17座,对祭坛也作了局部解剖。赵宝沟文化氏族成员住房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方形或长方形。长方形房址进深大于间宽,向阳一侧设门道。圆形灶址设在房屋正中,四角有柱洞。面积最小者为20余平方米,一般为50—60余平方米,最大的房屋超过100平方米。每一排房址中均有尊者居住的大房址,每一聚落又有一、二座房址居于中部或最高处,应是聚落最尊者的居所。

从发掘所获得的赵宝沟文化陶器、石器、骨器等,显示了当时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在北方诸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以磨光黑陶和灰陶为主。器形种类复杂多样,主要是筒形罐,还有椭圆底罐、圈足碗、平底或圜底钵、尊、盂、盆、豆器皿等。容器无论大小均施以各种各样的由几何图案组成的纹饰,有压印的之字纹组成的编织纹、镇印纹。尤以陶尊器皿上的动物纹饰最为精彩,头部的写实,躯体弯曲呈抽像的龙纹或凤纹。其中一件以鹿、猪为原型,以龙和鹰为原型的神鸟(凤),三种不同动物组成的中国第一“艺术神图”,绕尊之腹部一周,间饰雷云纹,并有翅膀,展翅飞翔于无边的天际,具有超越自然的力量。绘画采用透视技法,展开后富有齐头并进的艺术效果,中外学术界称之为“最早的一幅透视画”、“中国画坛之祖”。同类器物和类似的纹样图案还有7件,带有鹿纹和凤鸟的器皿各1件,均出土于同一座较大的房址中。这类器物并不是实用器,而是祭祀所用的神器。

赵宝沟文化的石器也独具特色,石耜多为扇面刃有肩和鞋底状尖锋两种,石料为细腻、坚硬的石灰岩,体薄规范。石斧两侧磨平,多为坚硬的黑色玄武岩。磨盘多为长方形,磨棒有弧形脊。细石器制作发达,

小山遗地一座房址中就出土数百件。骨器中有骨锥、骨刀等。在赵宝沟遗址东南房址中出土一批用蚌壳制作的压印陶器纹饰的工具,这座房址的主人可能是专绘陶器印压纹饰的技工。采集的动植物标本,有鹿、狍、猪等骨骼和胡桃楸果核等。

赵宝沟文化时期的聚落密度与兴隆洼文化时期基本相同,但居住的相对高度要比兴隆洼文化聚落高得多,而且视野也宽阔,或称之为森林中的聚落。遗址没有明显的围壕遗迹,可能是用木杆环聚扎成围栏以作防卫。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的每一聚落内仍然可以分出若干群体,每一群体又有一个最尊者来管理,一个最尊者来统一带领这些群体,他的居所便是公众议事或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聚落首领的带领下,去森林中狩猎、采集或到平川去刀耕火种,并在祭坛举行祭天祭各种神灵,以保佑丰收或狩猎中获得更多的食物。鹿是他们的主要猎取对象,也由此演化成为他们的图腾,还有的聚落崇拜猪、鹰。几种不同图腾绘于一器,似乎是记述着几个不同图腾崇拜的聚落联盟的往事。从调查中获得的赵宝沟文化遗址在空间分布中有成群分布,每一群又有较大的中心遗址的规律,这一群便构成一定范围之内的社会集团,这是兴隆洼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红山文化的土著源头之一。以努鲁儿虎山脉至滦河一带为其早期中心,至中晚期逐渐推进到西拉木伦河以北,向东扩展到阜新以东。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在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发现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陶尊,充分说明社会分化已很明显。而在中原,这类最早的‘艺术神器’,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堆塑,要比内蒙古地区晚一千余年”。

距今约六千至五千五百年前

红山文化先民遗存,在今赤峰红山后发现。海拔750余米的红山,位于英金河畔,面积近10平方公里。

红山文化先民遗迹主要分布于红山后一带,除居住聚落址外,尚有墓葬等遗存。这是北方草原地区以彩陶、“之”字形纹陶、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细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的原始文化,表明红山文化先民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游牧、渔猎为其经济形态,这是我国北方最早等多种经济结构类型。

红山文化有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当时的人类已掌握了“淘土”技术,陶质细腻、坚硬,多为泥质红陶,烧制的壶、盆、罐、钵、瓮,再施以黑彩,或印、压、划、刻各种纹饰,尤为雅致大方。彩陶花纹以半圆形、三角形、斜线形、菱形、鳞形、水涡纹为习见,图案简洁、明快。

红山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成熟。以磨制为主,大多光滑平整,常用器多为农业生产工具石耜、斧、刀、锄、磨盘等。以石耜最有特色,外形近似现代犁铧,是我国北方最早的掘土农具之一。半月形穿孔石刀多有发现,这是我国北方早期的收割农具(掐谷刀),器体扁平,磨制精细,刃部锋利,穿孔规整,尽管后来金属农业工具出现,但数千年来,北方收割掐穗农具却一直保持着红山文化双孔半月形石刀的形制。细石器的制作极其精巧别致,石料多选用细腻、坚硬的燧石、碧玉、水晶等,均用人工打击,其工艺不亚于近代微雕,器形多叶、片、簇等细小器,与骨、木组合成复合用具。

红山文化石制农业生产工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成套农具组合,从破荒(耜)、耕地(锄)、松土(铲)到收割(石刀)、加工(磨盘、磨棒),均有发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摆脱刀耕火种的初级阶段,而向着精耕细作的高级阶段推进。农业的发展,无疑会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红山文化即代表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农业文明。

红山文化有着广阔的分布范围,以西辽河上游赤峰为中心,西至张北,南抵京津,东越辽河,北跨大兴安岭。近年周边地区陆续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容,为复原红山文化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考古材料。在这些新发现中,“玉器”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地处西拉木伦河南岸的翁牛特旗,从1972年以来,先后出土、发现早期的玉石龙、黄玉龙和碧玉龙,圆雕精细,造型古朴,被誉为“华夏第一

龙”,是中国尚玉文化和崇龙传统的发端地。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数十件成组玉器,除龙型器外,尚有玉蚕、玉鸟、猫头鹰等,这又表明赤峰地区远古时期就是产玉、制玉的基地,玉文化从北国草原播撒华夏各地,形成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玉文化传统,这是赤峰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赤峰后人的骄傲。

与玉文化共生的还有大型积石冢即远古氏族成员或集团举行盛大祭祀的场所,多筑于山间或群山之巅,规模宏伟,构筑壮观,出土有各类陶、石、玉祭器,使这种原始建筑显得尤为庄严、肃穆。

距今约五千三百年前

我国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先民遗迹,在今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畔富河沟门发现,学术界定名为富河文化。

在富河沟门聚落建筑中,共发掘房址 37 座,这些房屋均顺山坡地势而建,平面布局呈簸箕形,各房之间有土坎相连。平面建筑有方形、圆形两种,排列有序,一般面积为 20 平方米左右,房屋中央以石板砌成灶址,北壁多有屋柱,是一种“一顺水”斜坡屋顶式建筑。

富河文化的陶器很有特色,器皿均为夹砂灰褐陶,这是因为森林草原地区多腐植质土,与黄土红土丘陵地带土质有别,故陶质疏软,典型用器为筒形罐,大口、平底、直腹筒状,器表多印压、刻划横线或竖线“之”字形纹,线条流畅、飘洒自如,明快雅致,也是极好的陶制艺术品。

石器数量很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大型锄形器,刃部锋利,器身厚重,当为森林中砍伐用具;另一类为复合工具中的细石器——簇、锥、刮、钻等,这是森林民族狩猎常用工具,加工较细,多有使用痕迹。

骨器数量可观,这与先民狩猎、渔业生活有关。属于捕猎、宰杀用具有骨簇、骨刀、骨匕等,属于渔猎用具有鱼镖、鱼钩等。多用动物骨骼磨制雕琢制成。

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黄羊、獾、松鼠、狗、狐等,属于草原森林动物群,其中鹿、黄羊、獾、狗等,都是当时人类猎取的肉

食。

森林草原民族居住环境有较大的移动性,大型、不便携带的贮藏器不多,也没有发现农耕生产工具,其经济类型甚为明显,即以狩猎、渔业为主。由于先民们经常出猎与大自然打交道,他们信仰一种朴素的“占卜”术,即用动物胛骨的平面,灼以纹路,占卜吉凶,指导他们的生产生活,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遗址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卜骨”,就是这种原始的占卜术的真实记录。

富河文化首次在巴林左旗发现后,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其他地区,以及邻近哲里木盟也有发现,据地下发掘的碳化物经 C14 测定,距今约 5300 余年,是继红山文化以后,赤峰北部草原地区出现的一种新的原始文化类型,它和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氏族成员创造的远古文化,共同推进着北国远古文明的历史进程。

距今约四千五百余年前

小河沿文化,是由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时代,即由氏族社会向着阶级社会迈进的承上启下的文化类型,在中国北方人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74 年敖汉旗小河沿遗址的发掘,1977 年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大南沟氏族墓群的发现、发掘的成果,获得的考古材料相当丰富。

小河沿文化有一组特征明显的陶器群,陶质细腻、质地坚硬、表面磨光、平整光滑的“黑陶”在这里首次被发现。多数陶器上压印工整美观的细绳纹,以及细绳纹交叉组合而成的“回纹”图案,早期习见的“之”字形纹不见了,这既是氏族变迁的结果,也是人类审美情趣转变的反映。

彩陶,在红山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色彩有黑、红、棕多色,图案也较复杂,有成组的回纹、古万字纹、三角纹、八角、网格等纹,红彩、粉衣、彩绘也随之出现,使彩陶器皿显得格外华美雅致。

石器虽然是主要的生产、生活用具,但制作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大量磨制精细、穿孔按柄的斧、锛、钺等精美玉石作品。细石器制作

极为精巧,完整的骨柄砌刀,刃部镶嵌的“刀片”体薄、坚硬、锋利,并用类似植物胶的黑色粘剂固定骨槽之中,极为美观别致。

这个时期在丧葬礼俗方面也独具特色。氏族公共墓地选择在高山顶上,这种高山型墓地在中国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实属罕见。墓地按氏族成员分葬三个不同区,方向有别,尊贵有序。除单人葬外,出现了男女合葬习俗,但这种合葬形式,不似后期奴隶制以后的男女同向,以示相依不舍,这里的合葬却是背向相埋,仅脚部相连,这是中国早期合葬的初期形式。

考古现场观察表明,许多墓坑、骨架多经火烧,可以认定,氏族部落在掩埋自己的成员时,在墓地曾举过祭火或火葬仪式,这是北方狩猎、游牧民族,最古老、最隆重的宗教礼仪。墓葬中,有的无头颅,仅有身躯和四肢,但掩埋时,氏族成员却为这些失去头颅人特制一个假头,即用钵、罐扣在头部,再加以装饰,使之保持“完整”的身躯,这应是氏族部落为纪念这些失去头颅的“英雄”而举行的特别葬礼。

从诸多墓葬随葬品观察显示,当时已出现了贫富悬殊,男女之间、成年与幼年之间,已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男子地位明显高于妇女,以“家”为基本生活、生产单位已初步确立,原始公社正面临着解体,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赤峰小河沿文化先民,正在北国向着阶级社会的门槛迈进。

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前

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时代先民遗存在今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发现,其年代相当于中国历史纪年的商朝早期或夏代,考古学界命名为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

其大型聚落建筑地理环境多选择在丘陵山地,或在群山环绕或在河岸台地山岗上构筑城寨,并在周围选择有利于防卫的若干小山岗修筑小城堡,从高空瞩目,犹如众星捧月的“卫星城”,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奴隶制孕育阶段,故学术界有人称它为“城邦奴隶制山城”,在赤峰大

地、两河流域广泛分布，仅敖汉旗境内就有 100 余处。

城寨构筑坚固、壮观。以松山区孤山子乡北城子山为例，整个山城由三重城构成，周长千余米，外城顺山势以石块垒砌围墙，每隔 50 米有一座圆形建筑，即城墙上的马面（敌楼或敌橹），三重城的城墙正中均有城门，北向，构成一座严密而又完整的城寨建筑。城内建筑密布，以圆形房址为多，少者数十座，多者百余座，均用石砌房基，各房屋之间以石砌步阶相连。城内多有水井，以供饮用。先民们居住的每一座城堡就是一个部落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是中国北方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出现时的历史特点。

台地型聚落建筑，地势较缓，多依河岸，大多筑有地穴形、半地穴形或平地起建房屋，住房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房屋构造也较讲究，生炊、取暖、照明设施初具。

石器仍然是主要生产工具，但种类增多，制作更为先进、精致。制陶业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三足礼器鼎、鬲、甗、鬻等开始出现，成套的礼器（罐、豆、壶、或鼎、豆、碗）普遍使用，彩绘陶，其纹饰多达数十种，这些纹饰多被商、周时期青铜器所沿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工艺，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其彩绘多施于礼器，以黑、红、白三色绘于黑地陶器上，庄重大方，鲜艳夺目，其图案除写实的花草、蛇纹外，多为构思精巧的“抽象”作品，以雷纹、勾云纹、饕餮（兽面）纹为习见，构图严谨，布局对称，内涵深邃，意境奥妙，考古材料表明，这些作品出自当时的民间绘画艺术家之手。

夏家店下层文化以赤峰为中心，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东至辽河，西抵张家口，南达京津，北越西拉木伦河，处在赤峰的居民，当与燕、山戎先祖有关，他们是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明的开拓者，也是商、周中国青铜器鼎盛时期的奠基者。

夏商时期

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前

早商时期，西辽河上游赤峰地区存在一个城邦奴隶制社会形态。考古人员在今敖汉旗、松山区阴河、英金河流域等地发现大批规模宏伟、建筑坚森、布局严密的石筑城堡，大多建在高山顶或山坡间，今民称“城子山”（或城子地），城内大小住房密布，城垣石筑，辟有多道城门和城楼（故鲁）。敖汉旗石匠沟、松山区水地八家、迟家营子、孤山子等城堡最为典型。这些高山型城寨，已引起考古界、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距今约四千二百多年前

夏、商之际，西辽河上游赤峰地区当为商世侯国或方族封地。在今克什克腾旗土城子天宝同、松山区五三乡以及翁牛特旗梧桐花头牌子等地，先后发现早商时期大型青铜礼器——铜鼎、铜甗等。头牌子出土的铜甗内腹底部，首次发现两个铭文，其中一个作“𠙴”（表示城郭），另一个作“中”（释作宁或贮），这很可能是商世侯国或方族的标志。说明远在早商时期，今赤峰地区便存在一个与商族关系密切、拥有贵族特权的世侯国或方族。

公元前 21 世纪

商族先民“邑于紫蒙之野”（今老哈河流域），至公元前 20 世纪初，

迁居于“砥石”(今西拉木伦河上游克什克腾旗南部山川)。至夏代，商族先民由西辽河上游，越过内蒙古高原，进发中原，灭夏建商，开创了先秦时期鼎盛历史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公元前 19 世纪前后

“天之骄子”东胡族发祥在今赤峰老哈河一带，并以土方、屠河、徒河不同称谓见诸于中国史籍。西周至春秋时期发展到“百有余戎”，各有酋长，然莫能相一。至战国时期，定居于赤峰黑里河川，并以今宁城县南部山区为重要活动基地，成为中国北方实力雄厚的强族，对后来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有过重要的影响。

强盛时期的东胡族，不仅与邻近部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原各族也有过友好往来。宁城甸子乡小黑石沟东胡贵族大墓，在出土的 700 余件文物中，既有北方传统用品，也有中原风格遗物，尤其作为青铜礼器簋、豆、簠等，更为精美绝伦，在一件方簋底部铸有“许季姜簋”铭文，这是地处今河南许昌一带古代许国贵族与东胡友好往来的见证。

西周至春秋时期

周惠王十一年（公元前 666 年）

蕴藏铜矿的林西县官地镇，开始了对铜矿的开采、冶炼。考古发现的遗存表明，该铜矿当时不仅有规模较大的坑道、矿工居住、操作的“工棚”，而且有露天采掘、选矿、冶炼、鼓铸等完整的工序并采用鼓风技术。经碳 14 测定，官地大井古铜矿距今约 2700——2900 年，它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并列为中国南、北地区时伐最早、规模最大、采冶工序完整的两座铜矿，在中国古代矿产采治和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 663 年）

春秋时期，居于赤峰地区的燕族，常受到来自东部山戎的威胁，当时燕、齐为友好邻邦，燕求助于齐。公元前 663 年，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制令支（族）、斩孤竹而南归。齐军出齐鲁，经京津、越燕国，到达今赤峰一带，南北数千里。正是这条北伐的军事路线，成为后来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文化交流、民族往来的主要通道，是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一块丰碑。

战国秦汉时期

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 300 年）

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地处北方，国弱地小，常受邻国、邻族，特别是东胡的军事威胁。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 300 年），燕国国君昭王招贤纳士、富国强兵，转守为攻，派大将秦开率军北伐，一举击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退居西拉木伦河流域草原地区。燕国屯田戍守，修筑长城，并设辽东、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五郡以拒胡。其中右北平郡址即在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燕破东胡，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民族大融合的序幕，也是赤峰历史上首次设立郡县。燕国长城东起襄平（今辽阳）、西止造阳（今张北），经赤峰南部，境内长约 300 余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修筑的长城之一。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

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设立郡县，推行统一措施。今赤峰属秦国辽西、右北平所辖，下有属县，在赤峰三眼井、敖汉老虎山、市区蜘蛛山等地，曾出土当年统一度量衡时所颁发的标准器物——陶量、铁权，刻、铸秦始皇廿六年由丞相李斯撰写的诏书全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测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表明秦国统一举措，在北方边陲和中原内地一样有效推行。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

一统天下的秦国，为继续巩固政权，扩大统一事业，开始修缮、扩建、连接“三国（秦、燕、赵）边于匈奴（东胡）”的长城——秦国万里长城。西起临洮（甘肃）、东止辽东（辽阳），经赤峰南部当铺地、王家店、水地、安庆沟、敖汉等地，境内长 250 余公里，沿线有多处烽火台、戍守城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

活动在黄河河套、阴山山脉一带的匈奴再度崛起，并于公元前 209 年举兵东征，大破东胡。生息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部落联盟，迅速瓦解，残部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称乌桓部；一支退居鲜卑山，称鲜卑部。此后，今赤峰大部分地区属匈奴左地。

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

匈奴的再度兴盛，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重大威胁。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穷兵黩武，发动了长达 10 年的汉匈战争，小战数十次，大战十余次，辽西、右北平（今朝阳、赤峰）一线战事尤为激烈，今宁城南部山区是当时重要的战场。匈奴先后出兵百余万，匈奴伤亡近 30 万众，给草原游牧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

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 5 万骑，出右北平，击破匈奴左地。西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再度南下，修筑了东起山海关西止甘肃以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万里长城”。今赤峰地区正扼汉长城中段，在喀喇沁、宁城南部山区，汉代烽火台密布，遥遥相望，城堡坚森。在赤峰境内长城约

150 公里。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又将退居漠北的乌桓、鲜卑部,南迁至辽东、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五郡塞外,(今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形成了赤峰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局面。“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遗(百姓)亡干戈之役”,为草原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 9 年）

王莽新政开郡国铸钱之例,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成为东汉初期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郡国铸钱基地,主要铸造“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流通币,由中央主管铸钱的官吏(钟官工)主持监造,并有郡国铸钱编号。大量钱范的发现和相应钱币的出土,表明当时草原地区商品交换,经济景况日趋活跃。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 49 年）

乌桓部众部分南迁,另一部分留居原地归属鲜卑。是时,五郡塞外地遂为鲜卑所踞。直至三国时期。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近千余人,内附接受汉帝册封。汉廷在其辖境复置护乌桓校尉。

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 54 年）

鲜卑内附,汉廷令居乌桓故地。鲜卑大人入朝,接受汉帝封赏。

东汉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

鲜卑首领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今赤峰为东部宇文鲜卑居地,亦即契丹先祖,《耶律羽之墓志铭》在追述契丹先祖时明确记载:“其先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

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

曹操为统一大业，于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率军亲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以田畴为向导出卢龙塞，经白檀，历平刚，登白狼，指柳城，掠其众 20 余万，大批乌桓人南迁与中原汉人杂居融合，留居原地的乌桓、鲜卑，也进一步融合，为后来契丹族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

田畴，右北平（今宁城黑城）人，谋士，因对三郡乌桓杀人过多不满，闲居在家。当曹军梅雨路泞受阻时问田畴，畴曰：“可取道卢龙塞（今喜峰口）直达柳城，只是小路。”曹令甩掉辎重，由田畴带路，暂山埋谷行 500 里，在敌毫无防备情况下一举成功。曹征塞北，田畴立了头功。